

吕氏春秋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谷声应 译注

LI SHI CHUN QIU BAI HUA JIN YI



中国书店

吕氏春秋

白话今译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



2 020 3618 0

谷声应 译注

LI SHI CHUN QIU BAI HUA JIN YI



中国书店

(京)新登字 213 号

本丛书顾问: 启 功 郭预衡

责任编辑: 凡 炎 李海燕

吕氏春秋白话今译

谷声应 译注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南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15.875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68-454-5/B·76

定价:10.50元

序

这套“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从时间上看，正赶上由《资治通鉴》白话本出版而激起的古文今译热潮。既是“潮”，那就该归为“显学”，这个名称总是不大入耳的。而且，在有的人看来，将典雅古奥的国粹糟塌成浅俗不堪的白话，无异于挖掘祖坟，粗鄙无道。只是这潮仍不可阻遏地热起来了，起码说，还有许多读者喜爱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我常想，既然老祖宗的东西各个时代都有人注，而且注得好的都成了大师，拿不大准的就多多益善地收罗先人的话充数，号称什么经“注我”；甚至自己不“注”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大美不言”的化境，不但免遭物议，反为同行相与乐道。那么，今天我们译成大白话，不妨也可以冒充成一种注罢。当然，大潮一起，免不了泛些泥沙残渣，恰如这套丛书免不了多有注译上的错讹一样；但潮落之后，大浪淘沙，或者会有精妙之作显露出来。

先秦诸子的时代，在我国历史上是读书人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最活跃、少束缚的时代，也是一个异彩纷呈、硕果累累、最为辉煌璀璨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组成我们民族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大思想宝库，就有两家半（因为佛教也中国化了）兴起于先秦。可惜自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重现过同样令人激动和向往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壮观的局面。先有暴君秦始皇因惧悛

思想的伟力而“坑儒”，继以汉武帝为了“役心”的需要，采纳最长于给同类致命一击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终究只尚一家，儒家变成了儒教。更可怕的是其后近两千年，儒教与封建政体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形态，大大方便了统治者“动口”不行就“动手”，思想“教育”不奏效就施虐于肉体。于是，创造被扼杀了，“万马齐喑”成为不争之实。今天，欣逢大力提倡“思想再解放一点”的盛世，我们着手先秦诸子白话今译的工作，也是奢望以绵薄（精神的东西毕竟不如物质的来得直捷快当，此之谓“绵”；学养太浅，无能传其精髓达其要义，此之谓“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祖国曾有过的光辉时代，让更多的人歆享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文明，让更多的人汲取菁华，走出蒙昧，为中华的复兴增添一分力量！

一个时期，反传统文化成为时尚。有的人动辄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仿佛民国初闹革命，以为只要“咔嚓”一声将辫子剪掉，耳濡目染、浸淫五腑的封建污秽也随之而去。类似的“战斗”，从来没有成功过。“五四”时力倡“打倒孔家店”，现在不但没倒，香火还甚于从前。还有人辩护说那样做是为了“矫枉过正”，这不禁使人回忆起物质生产一“过正”就诞生“大跃进”的教训，我想精神文化的建设也不会例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传统”就是十全十美的（持此谬论者也大有人在）。只是，既然“传”诸后代而成为“统”，那就有它的合理性和它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固然与具体的时代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甚至无法弄清是它在规定政治，还是政治常常要利用它；但是，传统文化绝不等同于它们，它是更趋于永恒的东西（如果不是伪文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种

具体的政治体制被更进步的取代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可以增添新鲜血液，可以芟除与生俱来或在时间长河中衍生的赘物，但绝对无法结束它和取代它！退后一步说吧，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挹伐所结出的果子；一定也与来不及了解对象就歌颂同样苦涩。这，也是我们译注先秦诸子的一个原因。

这套丛书，承蒙著名学者启功、郭预衡两位老先生的关心，我们深感荣幸。北师大中文系郭英德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吴龙辉博士对本丛书的组织编译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丛书最后由我审定，由于学力不逮，时间紧迫，加之译注者水平不一，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可以说，这套丛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应该归功于学界前辈的指导和学养我只能望其项背的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而它的所有不足，则应归咎于我的才疏学浅，力不胜任。

《先秦诸子今译丛书》主编 李 双

1992年8月21日于北京

导 言

《吕氏春秋》一书的产生据《史记·吕不韦传》说，是吕不韦任秦丞相时，“以秦之强，羞不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因而“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而“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氏食客三千人，必不自同一思想学术派别，编撰出这样一部巨著，其困难可以想见，其内容的庞杂也自不待言。无怪乎《汉书·艺文志》把它作为杂家的代表作，认为它在学术思想上“兼儒墨、合名法”。侯外庐先生说它是杂家言的滥觞，认为其编制是“兼听杂学”的糅合，而没有创造精神。总之，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都是比较低的。再加之吕氏本人地位的可疑，许多学者往往只承认它的史料价值。对《吕氏春秋》历史学家冯友兰先生却说：“此书不名曰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史记谓吕不韦以其书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亦以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以吕氏春秋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是史公亦以此书为史也。”唯其如此，“则其所记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任继愈先生也认为“春秋已被引伸为古史的通称。

《吕氏春秋》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他还认为《吕氏春秋》是“秦汉哲学史的开端”，“开启了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潮，推动了汉初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细研《吕氏春秋》，我们认为，当今的学者如冯，任二位先生，才是摒弃了偏见的评价。吕书有其博大的思想内涵，决非单纯的思想的糅合和史料的罗列，而采众家之长，形成了在即将实现封建大一统这个特殊时代所特有的一套体系，实为研究先秦史哲的十分重要的著作，以文学而论，文章可谓简练流畅，论证可谓条理分明，亦可称为典范，其历史地位应受到重视。

《吕氏春秋》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价值。

广收博取，采众家之长。这部书非吕氏一人撰写，而是吕氏以其强秦丞相之权位，令食客人人著所闻而成。这些代表着各思想学术派别的食客自然会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形势特点拿出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派别的文章来。加以按既定的纲目编写，这纲目有着明显的宗旨与主线，对文章的甄选想必是严格的。很明显，它不是论文集，而是有着统一思想的自成体系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专著。

《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已，孙臧贵势，王廖贵行，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吕氏春秋》将诸子长处各用一字加以精炼的概括。

《用众》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

《吕》书正是以这种胸怀来文纳众长的。这是一种择善而

从的态度，因此，它以继承发扬为主要形式，并不用扬一抑十的狭隘态度，这当是难能可贵的。

纵观《吕氏春秋》全书，百六十篇中体现了诸子学术观点，其中主要的有：老子、庄子、墨子、儒家、阴阳家、法家、兵家、农家等。

《吕氏春秋》多篇提及老子，阐释老子观点。老子的“道”又称“一”或“太一”，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概念。老子认为天道无为，《吕氏春秋》《去私》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吕》书《序意》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颡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知度》借老子的无为观改造为“因而不为”，《执一》说要“因性任物”，《贵公》说：“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序意》说：“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君守》说：“故日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而《任数》、《精谕》、《乐成》、《制乐》所说：“至智弃智，至仁记仁，至德不德”，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古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直接源于老子，连语气都象是老子的。但是，《吕氏春秋》却不但不学老子的避世，反而要积极地入世。

《吕氏春秋》有许多篇章直接脱胎于《庄子》，所记许多史实都来源于《庄子》。《贵公》、《贵生》、《当务》、《诚廉》、《慎人》、《必已》、《观世》、《离俗》、《审为》等篇中引用了《庄子》的许多故事。比如，管仲病重，桓公与论托国之臣，王子搜不肯为君，鲁君求颜阖不得，盗跖论“盗亦有道”，伯夷，叔齐故事，孔子穷

于陈蔡等等。《圜道》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直接取自《庄子·天运》的“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在宥》说：“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吕》书《圜道》就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贵当》说“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就是《庄子·骈拇》“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可续”思想的翻版。“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庄子·在宥》），与“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为国之本在于为身”（《吕》《执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运》）与《任数》的“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何其相似！《庄子·列御寇》说观人有“九征”，《论人》就有“八观六验”，“六戚四隐”之说。我们可以在《吕氏春秋》许多篇章中看到庄子思想学术观点的影响。

《吕》书的《当染》篇直接源于《墨子·所染》，在《听言》、《离俗》、《用民》、《适威》中，《吕》书发扬了墨家爱利之为道的思想、兼爱的主张。《当染》、《知士》、《审己》、《谨听》、《本味》、《义赏》、《先识》、《观世》等篇反复论证察贤用贤，以贤者为师、不论贵贱等等，《论威》、《高义》、《无义》等又将墨家所崇尚的“义”的含义发展成了利人、救危、公正、有信誉，将义作为道德行为的最高规范。《节丧》、《安死》等篇发扬了墨子节丧的主张，但摒弃了墨子的神鬼思想。

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孝道，尊师，音乐的理论 and 观点，在

《吕》书中也都有所体现。《处方》说：“凡为治必先定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六者当位”，“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是“治乱之纪也”。《孝行》认为：“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这些说法，都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说法相吻合。《吕氏春秋》的乐论有七篇，《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中对音乐有教化之功的认识是儒家的主张和理论。而《诬徒》、《尊师》、《劝学》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发挥。

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后期得到迅速发展。其观点是在“深观阴阳消息”之后得出的“五德终始”论，用阴阳消长来说明四时交替，五行相生相胜，还有天譴天瑞说，这此观点在《吕氏春秋》中贯穿始终，十二纪纪首以阴阳二气解释季节变化，用五行、五色、五音、五方、五祀与之相配，并要政令与时令相配，认为如果不相配就会引起灾异，阴阳相生相胜，《应同》中说：“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不仅有天譴天瑞学说，还以五行相生相胜来劝谕秦王利用天数受命为帝改制易色，以水德王而应之，否则天意又将他属矣。简

直就是邹衍“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说明。

此外，法家言、兵家言、农家言也都是《吕氏春秋》采纳的诸子之说，其中农家言以《上农》为纲，表现了重农主张。但吕氏本人是商人，因此他绝不会象商鞅那样唯农抑商，而是先农次商，这种思想施于政策倒是更有利于社会发展。

总观《吕》书学术观点，我们认为它正如高诱注的序文所说：“不韦乃集儒者之使著其所闻，……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

就是说，在《吕》书中，“道德”，“无为”是内容，“忠义”，“公方”是形式。这一点，吕氏本人在《序意》中也如是看。

（二）思想价值。

《吕氏春秋》对各家的思想观点并非兼收并蓄，而是尽量摒弃其矛盾之处，通过综合形成自己的体系。

《吕》书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大乐》），何谓“太一”？“太一”就是“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宇宙之混沌状态为“一”，因其久远，故称“太一”。混沌初开，生出天与地，天地又生阴阳，阴阳相互作用产生万物。在《大乐》、《知分》、《尽数》、《先己》、《侈乐》、《圜道》、《功名》、《论人》、《本生》、《贵当》、《当赏》等篇中都谈及万物本性及其规律，《吕》书承认天地万物的客观必然性，认为它没有意志，完全没有神秘色彩，这就是《吕》书所表现出的宇宙观。《贵因》篇提出了一个概念“因”，就是要认识自然，要掌握其规律性，要利用自然规律去改造环境，这就是在天人关系上

“法天地”的规范。然而，在天人感应的问题上，它没能脱窠臼，保留了五德终始祥瑞灾异学说，但《制乐》说：“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人事能更易天命。作者意在劝人弃恶从善，但人的主观因素在天面前能起积极作用，人还是因天有术的思想，似乎还有些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在认识论上，也有其独到之见。《尊师》说：“有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达天性也。”人具备认识和感知事物的器官，这只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条件，学习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学习可使人获益并达天性。

事物的本性和规律是可以认知的，所以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求因知化，找到规律性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认识。《察今》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知化》说：“凡智之贵，贵知化也。人主之惑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只有由表相而本质，由特殊而一般，人们才能少犯错误。

在认识的方法上，《吕》书力主去除主观性片面性，《去尤》《去寡》用疑人窃钗和目中无人的故事，教育人们去除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吕》书主张审名求实，名实相当，主张正确运用逻辑思维方法，批判诡辩，主张分清是非，《重己》说：“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离谓》说：“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吕》书还主张“察”，不仅要察今，还要察微，既要察传也要察贤，不仅要察疑，更要察不疑。《有度》说：“人之知不昏乎其所以知，而昏乎其所未知”，《谨听》说：“人生之性，莫过于所疑，而过于其所不疑；莫过于所不知，而过于其所以知。故虽不

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这种认识方法，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

《吕氏春秋》涉及的思想范畴很广，它还对人的情欲进行了论说，表明了它在人性论问题上的见解。《情欲》：“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贵当》：“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历皆然，所以为之异”，人的情欲是正当而合理的，但要适度，并用正当的方法加以满足，因此，《吕》书主张情欲以全生为标准，以合乎人情为标准（《知接》），并且要看重道德正义。《贵生》就主张：“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倘若“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迫生较死都不如，是因为其精神上的受辱，较物质上的不足更令人难堪。《吕氏春秋》对死亡的认识也较为科学先进，他不承认鬼神和天命，《本生》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人产生于自然，成长于社会。不信长生不老，相信死生是自然规律，《节丧》、《尽数》都主张通过养生来尽其天年，“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节丧》还说：“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不因人死有知，而因活着的亲人感情上的需要，这显然与有鬼论是截然不同的。《吕》书的生死观是科学的。

《吕》书极重视养生，养生是为了全生。总括《先己》，《情欲》、《本生》、《尽数》观点就是劳、欲要有节制，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要过分。精神要旺健，体魄要运动，开塞通窍，化滞去郁，这样精气血脉才能畅通无阻，也就能身强体健，尽其天年。这一点还区别于后其的老庄学说。

另外,《吕氏春秋》还不惮批评当朝君王。

(三)政治社会价值。

吕氏组织庞大的写作班子,经过严格的编写,形成这一部完整的著述,绝对不只是为与赵、楚、魏、齐四君子争雄,也不只是文人著书与荀卿等人争名。书成之后悬之咸阳市门千金买锥也不会仅仅是权势的矜夸,应该说,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在内。吕不韦能将子楚居为奇货,出资为他购嗣,其政治野心是很大的。他本人由商人而丞相,对仄国的治理和秦并六国的军事行动都做出过不少贡献,他显系一名成熟的政治家,而对即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他要借这部书谈出他的设想,他目光并不短浅,一方面促成统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拿出一整套治理的方案。将这部巨悬之咸阳市门,并许以一字千金,非常符合吕氏性格,他既要搏名又要获利,既有政治上的野心,又有改不掉的商人气质。其作法的实效是验证了自己的威势,又对这部书作了极精彩有效的宣传,扩大了吕氏及《吕氏春秋》的知名度。我们认为,这部书不是材料汇编,而一整套理论体系和管理方法,它总结了先秦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一大统局面找到了较完备的一套管理办法。吕不韦以仲父出入官禁,威高权重,似乎不必为争一时之胜如此费心费力的,但正是这种政治的欲望和野心,才使得他要不断地去影响这个实际上是他亲儿子的秦王政。

从《吕氏春秋》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其端倪。《吕氏春秋》认为君可废君道不可废。《恃群览》说:“故群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入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这部书对治理国家有一系列看法,它认为社会的治理兴盛首先要行君道,“君道何如?利

而物利”，君主要利民利天下，而不可自利。就是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实现治世，武王之所以胜殷，就是顺应民心的缘故（《贵因》）。要用贤。《求人》、《观世》、《先识览》等都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要制定治国之法。《察今》：“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要抓住时机（天时）并进行主观努力（人事），在《首时》、《长攻》、《慎人》、《必已》、《遇合》诸篇中都不断阐发这个观点。如，“舜遇于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慎人》），“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长攻》），客观条件有偶然性，但主观努力却不可少。这些见解，在秦正举统一大业时乃至秦统一六国之后无疑都很有意义。他还主张君应因而无为，臣却要奋力而为，即所谓“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任数》），君王要用人才，而臣民是为人所用。主张开明政治。《达郁》说：“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要开放言路，君王要择善而从。主张《上农》，重视农业经验，并兼顾工商等业的发展。主张尊师养士：“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报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诬徒》、《谨听》、《士节》、《知士》都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把《吕氏春秋》的一系列主张作个爬梳之后，我们便惊异地发现，这竟然是不折不扣的一套治天下的大纲！

秦始皇实行了严苛的政治统治，结果庞大的封建帝国却二世而亡，倘若历史按吕氏的主张发展，当又是一番风光。

我们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政治价值决不低于其思想学术价值。

对于《吕氏春秋》,一些学者因吕氏出身低贱而废言,对它评价不高,但它洋洋二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却无人敢不觑,《吕》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按四季十二月排列,每纪有纪首一、子篇四共五篇,共六十篇。纪后有《序意》一篇,是纪的序言。八览每览有论文八,以首篇为各览命题,唯《有始览》缺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各论有六篇,共三十六篇,全书百六十篇。

从结构上看,《吕氏春秋》的编撰是有纲在先,因而整齐划一,而内容则相互关联,纪、览、论三大部分,每部分各分子篇,从不同角度、不同命题入手,有例证有论说,阐述自己的主张见解,几个子篇合成一部分,几个部分合成全书,这种系统和主线贯彻始终。

纪分十二,以四季为序,每季各有序、仲、季三纪。纪首即该月月令,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春季诸篇皆言养生,夏季诸篇讲树人,教化,都是生长壮大的问题,秋季讲用兵用刑,并讲用贤胜于用兵的道理,冬季人息粮藏,于是言死葬,并由岁寒联系到人的品格,气节。

八览的首览为《有始》,论天地有始。下含六篇是论任贤顺民,治乱祸福的问题。《孝行览》论孝行为本,既是做人之本,亦是治国之方,以正七篇皆围绕君子之行展开。《慎大览》论强国尤要谨慎,其下开篇,乃治国用兵方略。《先识览》论有道之士需有先见之明,其下论怎样获得正确的信识。《审分览》论为君之道,而下七篇就阐释南面之术。《审应览》说君王要慎重其辞,其下皆与察辩相关。《离欲览》论述王者应索求离世高士为